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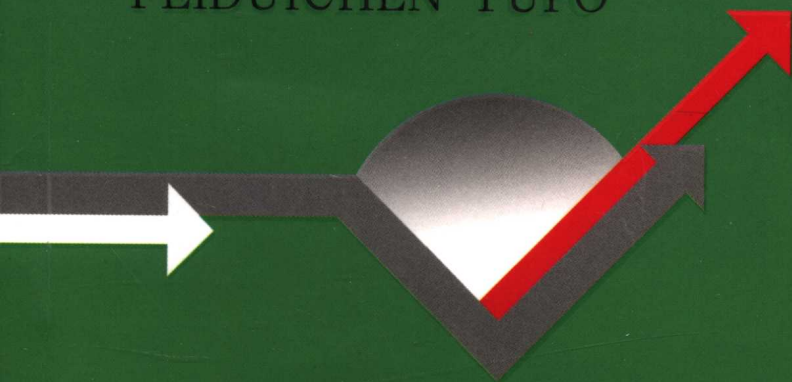
# 供给创新和

世纪之交世界经济结构变动研究

# 非对称突破

陆寒寅 / 著

GONGGEI CHUANGXIN HE  
FEIDUICHEN TUPO



学林出版社

# 供给创新和

非对称突破

# 非对称突破

（作者：[作者姓名]）

G

（作者：[作者姓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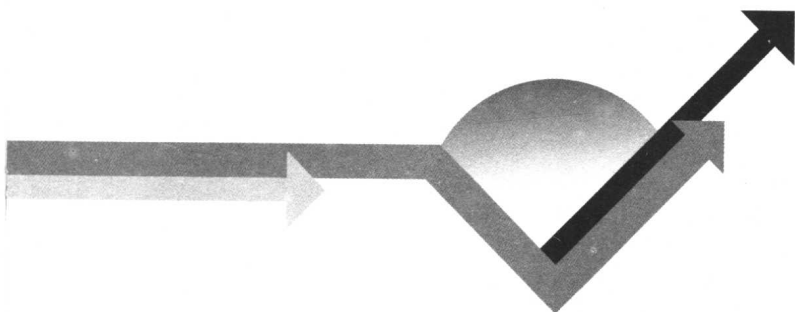
（作者：[作者姓名]）

# 供给创新和非对称突破

世纪之交世界经济结构变动研究

陆寒寅 / 著

Gonggei  
Chuangxin  
he  
Feiduichen  
Tupo



学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供给创新和非对称突破:世纪之交世界经济结构变动  
研究/陆寒寅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7  
ISBN 7-80668-992-3

I. 供... II. 陆... III. 经济结构-研究-世界  
IV. F11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5987 号

## 供给创新和非对称突破

——世纪之交世界经济结构变动研究



作 者——陆寒寅

责任编辑——吴耀根

封面设计——鲁继德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学林出版社~~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81号1楼)

电话:64515012 传真:64844088

印 刷——上海普教印刷厂

开 本——889×1194 1/32

印 张——8.75

字 数——20万

版 次——2005年7月第1版

200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3000

书 号——ISBN 7-80668-992-3/F·85

定 价——20.00元

## 序

欣闻陆寒寅博士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版,十分高兴。当陆寒寅博士要我作序时,我不假思索就答应了,因为我十分赞赏这篇博士论文,我赞赏这篇论文的主要理由在于它开创了世界经济研究的新方法,因为研究方法有了创造性的突破,所以研究的成果自然也就有了创造性的突破,这正像中国人所说的,欲善其功,必先利其器。

目前已经出版的世界经济专著或者教材大都采取了按照问题分类或者国别分类的研究方法,这样的研究方法大致有以下一些局限:第一,这样的研究方法难以构造科学研究所必需的逻辑演绎体系;第二,由于缺乏科学研究所必需的逻辑演绎体系,所以就会使得研究停留在表面现象上而难以揭示这些现象背后的内在联系;第三,无法展开多维度和动态化的研究,并借助于这样的研究来把握世界经济演进的逻辑和规律。

针对以往人们在研究世界经济方法上的这些缺陷,陆寒寅博士在博士论文中对研究世界经济的方法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以时间和空间为坐标,用时间演进和时空转换的观点,对当今极其复杂的世界经济作了系统的研究,从而发现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揭示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结构及其在空间分布上的特征,并对发生在今天全球经济生活中的“新经济”和“全球化”现象做了深刻的分析,从而全面地回答了以下三个发生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的基本问题:今天的世界在生产什么?它是用什么方法来生产的?并且,又是在哪里生产的?

以熊彼特的毁灭性创造理论和康德拉基耶夫的长波理论为基础,我们不难发现,今天的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信息时代,信息产品成为今天世界的主导产品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就像本文所分析的,经济结构在时间上的这种演进,必然会引起世界经济增长的空间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要求国际分工在空间上进行重组,这样,一个新的问题就产生了,那就是各种产品究竟会在什么地方生产。如果把以上两个变化联系在一起思考,那么我们又可以进一步发现,经济结构的时间演进一定会导致世界经济在空间上的膨胀,其中的道理就在于:世界新的产业革命不仅会导致结构的复杂化,而且还会产生进一步分工的需要,从而要求把更多的国家与地区组合到全球经济体系中来。世界经济体系的这种膨胀过程与霍金在《时间简史》中所描述的宇宙膨胀的机理是非常相似的。

当新的产业革命导致国际分工全球扩张的时候,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也就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地向前推进了。经济全球化既与世界经济的空间扩张有关,也与本次产业革命的主导产业恰好是信息产业高度相关。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全球化的经济活动究竟是怎样开展的?或者说究竟是由谁来组织的?本文通过研究以后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迅速崛起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的崛起改变了传统的生产面目,形成了网络化的全球生产体系,造成了产品内部基于价值链的垂直国际分工,从而使得经济全球化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世界经济发展的时间演进、空间膨胀和全球网络化生产体系的形成,是本文的三个重要发现,根据这样三个重要发现来构建一个崭新的世界经济分析体系,就可以对当今世界经济中发生的许多重大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比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之所以能够实现高速增长,就是因为它通过熊彼特所说的毁灭性创造,从与日本和欧洲的、几乎没有希望的汽车竞争到成功地走向了信息产业的创新;而日本经济的衰退和欧洲经济的停滞,就是因

为它们没有能够进行那种具有毁灭性创造的创新活动而导致经济增长依然停留在过去的经济时代；再如，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在最近 20 多年中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就是因为世界经济在空间上的膨胀给中国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又恰好使得中国有能力来把握这样的机遇；至于那些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失去了经济增长机会的国家和地区大都因为它们对经济全球化采取了抵制的态度，因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如若对经济全球化加以抵制，那么就必定会失去参与国际分工和合作的机会，然而，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国财富之最为重要的源泉恰好就是分工和贸易。

然而，令人感到担心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中国有两种非常可怕的、可能给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的倾向正在逐步形成之中。一种是反对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倾向，具有这种倾向的人们以经济安全为理由，主张降低贸易依存度、减少对外招商引资；另一种是过高估计中国实力、试图颠覆现有国际分工格局的倾向，具有这种倾向的人们主张人民币应当尽早升值，反对中国参与劳动要素密集产业的国际分工，主张通过产业升级参与国际高科技竞争。这样一些主张对不对呢？本文对此作了很好的回答。在此我们不妨作一些简单的提示：第一，中国的贸易依存度高，表明中国已经参与到国际产业内和由产品价值链组成的垂直分工体系中了，假如要降低中国的贸易依存度，那就意味着中国必须退出这样的国际分工体系，这样中国就很有可能走上拉美的内向化的发展道路而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第二，中国是一个劳动要素极其丰富的国家，假如我们真的减少对外招商引资，那么就势必会使中国对外失去廉价劳动的竞争优势，对内造成巨大规模的失业，从而使国家和人民蒙受巨大的损失；第三，人民币升值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几乎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在已经过去的 10 年中，中国依靠人民币贬值和汇率低估，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黄金十年”，尽管如此，中国至今还未实现充分就业，至今还没有发展到可

以依靠内需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地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主张人民币升值,其后果将与中国退出国际垂直分工体系是一样的;第四,中国的劳动力几乎无限可供给,但是中国的人力资本却高度匮乏,因此中国今天虽然可以倾其国力去攀登少数科学和尖端技术的高峰,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去参与人力资本密集的高科技产业分工和竞争则是没有可能的。

在今天的中国,之所以会产生这样一些错误的倾向,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持有以上这些观点的人并没有认真地研究世界经济,并把中国放到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格局中去思考和探索中国应当选择的正确的发展战略和路径。我们希望陆寒寅博士所撰写的这篇博士论文的公开出版,有助于推动国人对于上述问题的深入研究和理性思考。

华 民  
2004 年冬于公园 2000



# 导 论

## 一、研究动因

世纪之交,随着战后阻隔东西方世界近半世纪之久“铁幕”的骤然消失,以及新经济和全球化的忽如风靡,在人们的不经意之间,自资本主义诞生至今、尤其是战后以来始终吸引大批学者投诸笔墨、甚至耗尽唇舌的世界经济体系又一次在不期之间发生了深刻的变动。虽说“一场时代创新的全部冲击和响应,它的整个过程只有在这场创新结束以后才能确切看清——通过事后的回顾。但也必须承认,一个时代的许多重大特征在它结束以前就已经显而易见,在使时代开始的革命性突破发生之后,甚至缺乏先见之明的那个时代的观察家们也常常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尤其重要的是,应该注意到时代创新贯穿整个时代,其连续性虽然不免是一个展开的动态过程,但仍使这一时代成为一体。划时代的创新确实是纵横交错的网络状增长态势的动力源泉”<sup>①</sup>。

导致世纪之交这场变化的首要原因当推由大批量微电子技术创新引领而致、并在交通运输和信息传送等领域造成又一次产业突变的“新经济”。尽管信息技术产业(*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时,就已经成为推进美国生产率提高和比

---

<sup>①</sup> [美]西蒙·库兹涅茨,1989,《现代经济增长》,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第 4 页。

较优势发展的重要内容,但它在宏观政策和社会媒体方面引起的兴趣却相当有限,更多的仍局限于专家从工业领域和军事装备上所进行的研究。然而,当时间推展到 20 世纪 90 年代,仿佛就在一夕之间,计算机功能突然从原先的信息处理工具变成了信息沟通媒介,由此激发出从政府到公众对信息技术以及与此相关一系列政策问题,包括产权、盗版、安全性等等的巨大关注。尤为突出的是,互联网技术<sup>①</sup>的广泛采用催生出华尔街汹涌的投资热潮,原先一些专业领域内的名词如风险投资(*Venture Investment*)、股票首次公募(*IPOs*)等等迅速普及,甚至成为了公众常识。股市持续繁荣、特别是 1998—2000 年间由高科技股市场泡沫带来的巨大财富效应及高昂消费需求,又进一步推动大量企业积极投资于信息产业,消费和投资需求双方的显著正向连动,带来了以美国为首、整个世界经济和生产力的蓬勃增长与提高,许多人因此宣称“新经济时代”已经来临。“新经济”这个词本身出现于 20 世纪 80 年代,当时主要意指由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与此同时人们担心的是服务业经济将会导致增长放缓、价格提升和低工资就业岗位的增加<sup>②</sup>。1996 年前后,美国《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首当其冲,敏锐感觉到了美国经济发展中所呈现出不同以往的一些新气象,并由经济学家迈克尔·曼德尔(Michael Mandel)掌舵,推出系列评论文章探讨“新经济”性质和特征,首次强调“新经济”的时代内涵是技

---

① 本文的以下部分也有将这个名词按照英译称为“因特网”的。Internet 一词最早出现于 Vinton Cerf 和 Robert Kahn 于 1974 所写的一篇研究性论文之中,他们描述了一种“网络的网络”(Network of networks)将把全国、以至于全世界的计算机都联系起来。直到 1991 年夏天,一名美国的计算机系统的工程师 Tim Berners-Lee 才首先发明世界第一个 *World Wide Web* 软件。

② Jeffery Frankel and Peter Orszag, 2002, “*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in the 1990s*”, Cambridge: MIT Press, p. 362.

术推动型、低通胀和高增长的经济发展状态<sup>①</sup>，此后，虽然在经济学界对这样的注解仍然持有某种怀疑，但社会大众确是普遍认可了 90 年代的这一“新经济”标签。无论从怎样的角度看，90 年代的世界经济都显然有着令人侧目的特殊性，信息技术领域的高速进步、计算机作为信息处理和信息传送工具的迅速普及、在友好界面和视窗平台上互联网功能的强大推广、以及金融领域内融资和风险管理市场的深度发展，都汇聚成推动人类生产能力高速突破的启动器，更广范围内有效经济交往的技术屏障被大大降低。

全球化无疑是推动世纪之交世界经济体系变动的又一重要原因。虽说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跨国流动从来都不是值得惊讶的新鲜事，但世纪交接前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快速增长却是史无前例的：首先是国际贸易总量在过去的 25 年中增长了将近 4 倍，于 2000 年达到 12.4 万亿美元总值<sup>②</sup>；其次是跨国公司的惊人发展。根据最近的估计，目前大约 65 000 家跨国公司在全球有约 850 000 家子公司，这些公司的经济影响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加以测量：2001 年外国子公司拥有大约 5 400 万员工，1990 年是 2 400 万，它们的销售额达到将近 19 万亿美元，是 2001 年世界出口额的两倍以上，而在 1990 年这两个数字大致相等。在此同期，外流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额从 1.7 万亿美元增加到 6.6 万亿美元<sup>③</sup>，跨国公司已经有能力真正以全世界为舞台组织起最具竞争力的生产和最能获利的投资。

---

① Michael Mandel, 2000, “*The Coming Internet Depress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p. 153.

② 数据来源：UUNCTAD, 2002, <http://stats.unctad.org/restricted/eng/TableView/wdsvew/print.asp>.

③ 数据来源：UNCTAD, 2002 年,《2002 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和出口竞争力》，联合国：纽约和日内瓦。

表 1: 上升中的全球经济融合

|       | 相对于 GDP 的比例变化<br>1981—1985 至 1997—2001 |                   |
|-------|----------------------------------------|-------------------|
|       | 贸易 <sup>1</sup>                        | 外部融资 <sup>2</sup> |
|       | 百分比点数                                  |                   |
| 工业化国家 | 3.9                                    | 77.3              |
| 发展中国家 | 15.4                                   | 19.9              |

Source: *World Economic Outlook—Trade and Finance*, 2002, IMF, Sept.

注释: 1) 商品和服务进出口贸易额的总和除以 GDP。

冷战的结束带来了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体制的普遍趋同,而以推动自由贸易和国内经济开放为主旨的新自由主义又在西方国家普遍占得上风,再加上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技术扩散进程加快,致使世界需求和供给市场大大融通,经济概念中的空间结构再一次得到扩张。高度发达的通讯、运输技术又使得人类跨越空间的能力和成本极度下降,计算机、卫星、镭射、光学纤维和芯片技术的进步,使跨国公司事实上有能力在世界各个角落维持直接、或者说近乎实时的管理和控制。因此,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并不是空间意义的消失,而是空间意义的更为张扬,它打开了原本不相关的地域之间参与共同竞争的大门。全球市场上的短期资本流动更是以指数级扩张,当今的国际资本市场几乎每天都有高达上万亿美元的资金在转换和流动,对各个开放市场中的公司盈利、货币价值和资本利率变动做出及时反应,客观上也对不同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和经济活动,构成约束、甚至是冲击。诚然,全球化对于世界各地经济绩效的影响从来就不是单一的,其利益分配具有很大的不均衡性,或者说正是由于这种不均衡发展的本质,使得当前经济全球化赋予传统的世界经济结构以崭新的内容,并把后者带入新的状态和结构之中。

驱动这种新型世界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直接基础就来自于国际分工结构演化。从古典派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学说、大卫·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到新古典的俄林-赫克谢尔模型,始终在力图从不同的角度证明形成国际贸易、或者说是国际分工的根本原理,资源禀赋和劳动生产力的差异,则分别展现了国际分工中的历史、现实原因。换言之,从静态角度看分工的基础是生产力水平的时点差异,但从动态角度着眼,很大程度上具有历史传承性的资源禀赋特点,对国际分工成型具有根本的决定力。传统的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是一个层次鲜明的系统结构,其中包括“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两大并存的子系统,“水平分工”的成员国之问生产力发展程度基本上呈现出一个平滑而连续的时序过程;而“垂直分工”的成员国之问则是一种发达与不发达相互对立的间断性时序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讲,两者具有质的差异。任何一个国家实际上都处于各种不同“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的交汇点上,但由于从历史上看这一分工体系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积累越出国界所致,所以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内部“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交汇的现象十分明显,相反,不发达国家因为主要是在被动地承受发达国家所主导的资本国际积累,因此,在参与国际经济交往过程中,“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并存、交汇的状态并不明显,更多地是表现为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垂直分工”。然而,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这样一种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分工理论遭遇了来自于现实经济的严峻挑战。传统理论的侧重点在于强调各个国家的不同,包括资源、技术、甚至是口味的不同,因而导致了分工的展开和贸易的形成,但现实经济的状态却是国际贸易的量价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在经济发展程度和结构相似的国家之间完成的,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前,这更表现为是在发达国家之间完成的。由此,以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在市场结构和产业组织理论推陈出新的前提下,独树一帜地应时而生,在他看来,被传统理论奉为信条和准则的“差异性”,并不是推动国际贸易

产生的全部原因,专业化带来的内生优势包括规模经济和外部效应的自我强化,更是当代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重要成因<sup>①</sup>。与此同时,新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也先后纷现学术舞台,从各自的角度出发,致力于弥补传统学派对于国际分工格局和世界经济结构发展不平衡性理解的不足,他们在分析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更为强调寡头竞争、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并同时顾及历史过程、路径依赖、制度和空间位置,以及自我强化机制的作用等,注重对历史非连续性、非均衡性,及财富和权利全球分配随时间变化而发生深刻变动的关注。作为互相补充的整体学术架构,这一系列的新经济理论向我们提供了在新经济和全球化背景中,理解国际分工结构、以至世界经济体系变动的更为及时、适用和完善的理论工具。

诚然,“当我们还不能完全区分或归纳所有的复杂构成要素的时候,要用准确的定量方法来分析这些行为本身是不可能的,但以一种令人信服的定性方法进行演绎,却还是有可能的,而这种方法今天就被我们用来解释宏观经济结构的演化和变动……动态的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的就是在总量的层面上,解释增长、波动和结构的变化”<sup>②</sup>。世纪之交世界经济时序、空间和国际分工结构的一系列深刻变动,正在对原有的世界经济结构产生巨大的影响,用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的话说,这是一个版块碰撞期<sup>③</sup>,我们需要用一些新的眼光和理论,对这一结构变动进行重新的分析、理

---

① Paul Krugman, 1990, “*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Trade*”, Cambridge: MIT Press.

② Richard H. Day and Oleg V. Pavlov, “*Qualitative Dynamics and Macroeconomic Evolution in the very long run*” in Lionello F. Punzo, ed. 2001, *Cycles,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p. 95.

③ [美]莱斯特·瑟罗(Lester C. Thurow), 1998,《资本主义的未来:当今各种经济力量如何塑造未来世界》,周晓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解和评判。尤其是中国作为这个开放世界经济体中的后到者,全面地介入了这一轮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之中,13 亿人口的大国、连续近 20 年奇迹般 7% 以上的 GDP 年增长率,至 2000 年 GDP 总量已经突破 1 万亿美元大关,成为世界第六经济大国,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连续排名发展中国家首位,2003 年更是一举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外资引入国,中国的腾飞改变着世界经济结构。作为青年学者,我们有责任在这样的历史时期,以新的眼光和理论,分析和理解当今的世界经济特点、深入研究世界经济结构变动及其中的中国角色,以期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有比较科学的全面把握。

## 二、研究对象

正如题目所示,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世纪之交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动。需要说明的是,影响世界经济结构各个层面,包括新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结构演化的根本原因,在更早前的年代已经存在并有所显露,但无可否认,20 世纪的 90 年代中后叶是它们最集中展现和综合互动的时期,所以文中的“世纪之交”主要界定为上个世纪 90 年代直至新世纪的来临。

自从 Mokyr(1990)<sup>①</sup>以来,经济学家普遍认同驱动经济增长的三个主要源泉:首先是市场规模的扩大。如 16 世纪和 17 世纪新大陆的发现、19 世纪人口的增加、运输成本和贸易壁垒的降低,以及贸易政策的自由化都可以使市场得以扩张,从而开发原本不能达到的规模经济效益、降低创新风险——因为在新市场上融资和销售总比在原先旧有和固定的市场上更容易。市场促进经济增

---

<sup>①</sup> J. Mokyr, 1990, *The Level of Riches: "Technology Creativity and Economic Progress"*, Oxford: Oxford Univeristy Press, 转引自 Richard G. Lipsey: "Sources of Continued Long-run Economic Dynamis in the 21st Century, in OECD", 1999, "The Future of the Global Economy—Towards a Long Boom?" Paris: OECD Publication.

长的原因既有静态的,亦有动态的,首先,市场促进了现存资源的有效分配,并且,由于市场为最富生产性的社会活动重新分配了土地、劳动力与资金,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的可能。再者,市场竞争强迫生产者创新,并提高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因此正是市场,有力地促进了技术及其相对应的各种形式的生产创新,从而增强了经济增长的动量与势能。虽然市场的静态及动态因素均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随着作为生产技术基础的现代科学的出现,市场的动态因素已经成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因素<sup>①</sup>;其次是资本积累和投资。在标准的经济学分析中,纯粹的物质和人力资本投资,与技术进步是有区别的,但由资源投入型所驱动的经济增长,始终是最基本的增长形态;最后是技术进步。从长期而言,产品本身和生产过程的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潜力。在熊彼特看来,市场经济的增长是通过波动来实现的,它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周期、增长和结构性变动,在“熊彼特时钟”里,经济时间不规则地受到集团式创新的冲击,也就是丛簇状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冲击不稳定但却是系统性地影响着市场<sup>②</sup>,每个社会在采用这种技术时必须调整现有的制度结构,以充分实现创新所提供的经济增长潜力,这意味随着社会组织的巨大变动——新制度的产生和旧制度的逐渐淘汰,以及各种经济组织和社会集团相对地位的变化,经济增长范式相应地随之更替。并且,这样一种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关系不单在一国之内存在,同样在超越国界的世界范围内也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我们至少可以从三方面理解增长与世界经济结构变化的这种互动:其一,增长所包含的内容——如新产业的崛起和新需

---

① [美]罗伯特·吉尔平,1989,《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第26页。

② Lionello F. Punzo, ed. 2001, *Cycles,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reface.



求的形成——不断扩充着世界经济的时序结构内涵;其二,增长所扩张的外延——如新地区的加入和新供给渠道的获取——赋予世界经济结构新的空间伸展;其三,各国不同速、不同质增长的后果是国际分工结构和世界经济秩序的重新组合。

至于要给“世界经济结构”下一个完整的操作性定义,显然是很困难的,但即使如此,也并不妨碍我们去理解和研究这样一个专题。20世纪70年代,有鉴于当时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世界经济本身所发生的一系列震荡性事件,国际经济学界、尤其是研究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曾经掀起过一轮研究“国际经济秩序”高潮,其突出成果:一是在联合国通过了一份倡导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提案<sup>①</sup>;二是由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于1981年主持出版了《世界经济秩序——过去和未来》,这本论文集的作者云集了当时世界上研究这个领域的许多一流专家,包括Arthur Lewis, Gunnar Myrdal, Maurice Scott, Ronald Findlay, Amartya Sen, Jagdish Bhagwati 和 Samir Amin 等等,他们从贸易结构、贸易条件、技术传播、生产内容、金融系统、收入分配和内部改革等各个方面(参见图1),分别论述了当时工业化国家(*Indus-*

① 在1974年联合国一般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上正式呼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联合国自我保证“在所有国家中,为建立一个以公平、主权平等、共同利益和合作为基础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紧急行动起来,而不管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如何,它们将纠正不平等,矫正现有的不公正,使消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确保持续地加速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确保当代和后代的和平和正义,成为可能。”行动纲领要求做如下事情:改善针对穷国出口的贸易条件;更大的进入发达国家工业品市场;更大的财政援助和过去的债务减免;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有关贸易和发展问题的国际机构的决策方面有更大的发言权;国际粮食计划;更大的技术合作。联合国各个机构也多次重申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呼吁。

1995年,联合国世界发展高峰会议在哥本哈根召开,会议集中讨论了社会发展和就业问题,并发表《哥本哈根宣言》,在就业、援助、社会需要和社会因素等多方面作出承诺。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UNCTAD)定期地要求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减债、国际援助、商品政策和贸易促进等四个方面制定出新的政策方案。2000年前夕,联合国更是制定出《千年行动纲领》,旨在消除贫困、推进世界的均衡发展和繁荣。